

形势与选择:大学与城市 互动关系的理性审视*

● 牛军明

摘要:大学与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文明中心,两者的诞生、演化和互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总体而言,大学与城市存在着以下互动关系:趋同与求异并存,趋同不能忽视个性差异;主动与被动并存,但主动不等于迎合或控制;互补与依赖并存,但依赖不等于寄人篱下;显性与隐性并存,隐性的互动价值更加巨大。

关键词:大学;城市;互动;理性审视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未来城市发展的路径、目标和任务,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开启了“新型城镇化”道路。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后大众化”时代。“新型城镇化”和“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的到来,重新考验和确证着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多的城市都相继加入到发展大学和吸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大会战之中。理性审视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当代特征,不仅是对高等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一种理论确证,也是充分发挥大学与城市的双向互动作用、促进大学与城市系统化治理和共同发展的实践诉求。

一、趋同与求异并存:趋同不能忽视个性差异

当代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存在着许多模式化的趋同性发展特征,譬如兴办科技园区,修建大学城、建立大学与城市合作委员会等,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不断增强的客观结果。大学与城市的趋同性发展有其内在的动因。有学者曾列举企业(城市)需求大学帮助五条的最普遍动机,包括“解决迫在眉睫的技术问题”“获得长期利用大学某些设备或技术条件的愿望”“出于确保有条件利用或雇佣某些科研人员的愿望”“通过大学增强公司研究与开发的能力”“了解某些重要领域的前沿研究动态”

等。^[1]不难看出,企业(城市)与大学的趋同性发展是两者基于某些共性需要的互动结果。

大学与城市互动模式的趋同性发展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对经济全球化时代不同的大学和城市来说,趋同有其必然性,也有其重要性,并且积极正向的趋同能够打破大学与城市互动交流的习惯性思维,充分发挥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潜力,让不同区域的大学与城市互动有无,形成大学与城市互动战略、类型、方式、平台的新方法和新思维,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发展。譬如,斯坦福大学开创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创造了“硅谷”的经济奇迹,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效仿,成为推动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强劲动力,并造成了大学与城市互动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又如,空间集聚式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接受的大学与城市互动模式,美国五大湖的“铁锈”城市群与大学群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科研中心,横跨瑞典和丹麦的厄勒科技区(OSR)城市群汇集了两国12所大学组成的国家大学共同体,中国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与大学群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全国的97%,^[2]这都充分说明,大学与城市的趋同具有诸多正

*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和大连市政府资助项目“大学与城市互动研究”(L11WTA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牛军明/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向功能,加速了大学与城市的物质、资源、信息和文化流动,产生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趋同是一种社会现象,本身就具有正负两种功能。除了正向功能之外,大学与城市发展模式的盲目趋同也有诸多负向功能,可能会导致大学与城市忽视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一味地“引进”和“拿来”而不知“消化”和“吸收”,导致大学与城市的个性丧失、后续发展无力甚至造成“烂尾工程”,最终得不偿失,这尤其需要引起我国大学与城市的足够重视。中国大学与城市的互动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学与城市共舞”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与城市互动在政策、平台、手段、模式等方面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趋同性特征,譬如互动理念的趋同,互动结构的趋同、互动政策的趋同等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我国方兴未艾的大学城建设。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25个城市群已经建立起相匹配的17个左右大学群,这说明大学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同性战略选择。从整体来看,大学城市建设的确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诸多红利,但也有许多城市不顾实际情况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盲目规划大学城,造成许多大学虽然在形态上“集合”了,但在发展理念、师资力量、组织结构、文化建设等方面却先天不足甚至残缺,多数大学处于“零散组块”“随机发展”或“地域集合体”的沉寂状态,并未发挥出大学组织集群的活力和功能,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这是大学与城市一味模仿而不顾个性差异,盲目趋同而不求多元发展的显见后果。

当代大学与城市的趋同发展与求异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呈现出一种“整体趋同,局部求异”或“大趋同、小趋异”的发展态势。趋同性发展体现出大学与城市互动的某种内在需求,但城市与城市、大学与大学以及不同区域的大学与城市之间总是存在着个性化的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大学与城市的互动不能忽视自身独特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要学会借鉴和求同,更要学会创新和求异。盲目求同发展不符合大学与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大学与城市的具体要求实行个性化的发展才是可取之策略。譬如,产学研合作模式产生了硅谷的奇迹,但认为硅谷模式适合于所有城市,或者认为只要形成了产学研合作系统就能带来城市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就显得十分盲目和短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大学具有不同历史发展特征和区域文化背景,大学与城市在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有的需要以项目为纽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

合作关系,有的需要以平台为支撑,建立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共同投入的资源平台,也有的需要以产业技术联盟为核心,集中优势力量实现产业技术创新,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具体采用何种发展模式与合作策略是大学与城市在趋同发展的同时尊重个性差异的一种延伸,也是大学与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求异和创新的结果。

二、主动与被动并存:主动不等于迎合或控制

主动与被动是大学与城市在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具体性的行为特征。由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均衡,我国的大学与城市互动呈现出“一岭两高原”的地域分层特征和空间格局(以辽、京、津、冀、鲁、苏、沪、浙、粤等东部海岸城市为主的山岭和以豫湘鄂、川陕渝等中部城市为主的高原)。从总体特征上来看,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强劲的一线或二线城市,其大学的数量和规模也相对较大,城市与大学的互动频率较高,双方主动互动的区域性特征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乏力的中小城市,其大学的数量和规模则相对较小,大学与城市的互动频率较低,双方主动互动的区域性特征则不够明显。

随着生态型城市、智慧型城市、田园型城市、数字型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的不断革新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不断深入,主动合作已成为越来越多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的主旋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逐渐从最初的“单向主动型”“政府控制型”互动关系逐渐向“双向主动型”“政府引领型”互动关系发展。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加入到创办大学、引进大学和发展大学的“大会战”之中。譬如,淄博市政府在淄博师专升格的过程中,派出专门的宣传人员到北京做宣传,宣传当地高效的实力和特色,为淄博师专成功转型创造了机会;2010年厦门市政府出台的《厦门市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建设海西人才创业港,大力引进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实施意见》(简称“双百计划”),计划用5—10年引进1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和300名领军型创业人才,大学的作用将更加突显;2015年上海市出台了《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对未来15年上海市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以及质量评价等进行了系统规划,体现了上海市在高等教育方面的高瞻远瞩;2016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深圳市高等教育未来10年发展的总体思路,有利于增强高等教育在综合创新生态体系中的引擎作用,为深圳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提供支撑;2017年青岛市政府出台的《青岛市“十三五”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青岛市高等教育机构总数要增加至50所以上,研究生数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有助于形成青岛市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格局等。这些规划文件为当地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描绘了蓝图、吹响了号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许多大学也对城市发展问题作出积极呼应,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规划设计或与城市共同进行发展与治理研究,以响应城市未来发展需求,加强与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并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决策服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其一,通过建立专门化的城市规划学院或城市规划专业加强大学与城市的长效互动。譬如,1996年天津大学成立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要经营城市规划与设计研究;2000年广州大学成立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要进行地方城市建设与发展研究;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主要开展城市治理能力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其二,通过开展城市问题研讨会或城市发展论坛促进大学与城市的共同发展。譬如,2016年11月武汉大学联合南京大学举办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创新”研讨会暨“首届武汉大学城市规划论坛”,目的是优化城市区域空间格局,打造立体交通走廊,营造和谐社区,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前沿领域与未来课题。其三,通过跨国界、跨区域、跨学科的“大学或学科联盟”来推动大学与城市的深度合作。譬如,2016年5月上海交大与麻省理工学院(MIT)、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联合城市设计工作室”,该工作室由来自建筑、规划、设计和房地产专业的18名MIT、10名清华大学和10名上海交大教师和硕士研究生共38人组成,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大规模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以及城市有机更新等问题的方法与路径。总而言之,大学与城市的互动价值正在不断凸显,大学与城市的互惠与合作正作为一项长效的、基本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日益受到关注。

我们认为,大学对城市仅仅有适应性要求还不是一种良性的主动互动关系,大学还必须对城市的各项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保存着自身的反思、批判和扬弃,体现出对城市发展的超越和引领。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目标追求、价值取向和运行逻辑,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不管是大学主动地走向城市,还是城市主动地走向大学,大学与城市的互动都是阈限的,必须遵从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前提。内在逻辑对高等教育体系的作用“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系的作用一样,它要保持这种体系的特性;它是这种体

系的内在回转仪”^[3]。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表明大学与城市的主动性互动关系应至少体现出如下三种逻辑诉求:其一,大学需要城市的各项资源投入以维持发展,也需要城市提供人力资本输出市场为维持供需平衡,大学对城市的发展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其二,大学从本质而言是追求真理的场所,大学的特性是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要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但不能迎合城市的发展欲望和偏好;其三,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都存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城市中存在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以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很可能会影响到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独特精神和气质,城市的发展应以不妨害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精神为前提。

三、互补与依赖并存:依赖不等于寄人篱下

城市是大学的资源,大学是城市的资源,大学与城市在资源特质上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大学与城市在资源构成要素上的互补性依赖关系:一方面,城市是大学的环境资源,城市的存在能够为大学提供必要的人口和宿舍、充足的食物供应、相对低廉的物价、图书的制造与零售以及生活娱乐设施等,这正好满足了大学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大学对城市的资源依赖关系是自始至终的;另一方面,大学是城市的知识和人才资源,城市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大学的知识和人才辅助,大学通过知识、人才和科研创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知识和人才支撑,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进步,大学的数量和质量也成为当今和未来社会制约城市发展高度的一种基本力量。

大学与城市互补性的资源依赖和资源流动不等于大学的寄人篱下或城市的高高在上,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大学与城市共同关注。中国大学走的是一条赶超性道路,为了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城市和大学的跨越式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汕头大学和深圳大学的招生为起点,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式”新大学运动,中心城市办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地方化的基本力量。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来之后,为了扩大规模,实现集约效益,90年代后期的大学城建设成为“中国式造城”的一部分,一大批新型的大学或城市拔地而起。据笔者统计,截至2016年,在中国293个地级市中,有283个都建立了大学,在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除去港澳台),有21个都建立了大学城。从总体效果上来看,延续数十年的“新大学运动”和“大学城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地方化、多样化、科学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大大优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结构,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

化的进程。然而,“中国式造城”的背后确是一些不容回避的发展问题。诸多城市为了“办大学而办大学”,通过各种方式圈地皮、建高楼、引师资,办大学成了一种增加政绩和吸引外资的“面子工程”,完全忽视了大学的内部发展规律,部分高校跟着政府的指挥棒取舍进退,出现了诸如教学资源闲置、办学资金短缺、高层次人才匮乏、社会声誉不高、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人才培养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等现象。

大学与城市都是独立的实体,两者存在着异质资源的互补性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有限度”的依赖关系,但这种依赖关系不能等同于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中国大学与城市在互动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大学与城市的互动理念还不够成熟,要么是大学对城市的依赖过度,要么是城市对大学干预过度。中国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应该相互尊重,取长补短,注意对“度”和“量”的把握,从注重校区拓展、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凸显特色、强化合作的方向发展,并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使大学与城市的互动走向共生共融。

四、显性与隐性并存:隐性的互动价值更加巨大

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是显性的,更是隐性的。显性的互动关系是大学与城市互动全貌的冰山一角,隐性的互动关系则是大学与城市互动背后的洋洋大观。克拉克·克尔曾用三个“无与伦比”盛赞大学对当今社会(城市)的整体性贡献,认为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4]。不难看出,大学对城市的贡献既是显性可见的,也是隐性不可见的,大学与城市的互动是显性价值与隐性价值的统一。大学作为城市经济力、创造力、文化力和精神力等发展高度的代表,是城市软、硬实力提升的重要因子,必将在建设新型城市的道路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使命。审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既要看到大学与城市显见的互动关系,也要看到大学与城市隐性的互动关系。

大学是城市最重要经济的增长极之一,是城市硬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大学本身所承载的知识和人才优势对于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笔显而易见的宝贵财富。据估算,大学的科研投资所能获得的回报是其他投资的7倍左右,大学带来的价值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大学诞生之后,不仅以直接的方式向城市缴纳庞大的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附加税等基本税费,也以间接的方式拉动周边的地价、房价、交通、超市、宾馆、网吧、通讯、餐饮等实体行业和

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在1979年,马萨诸塞州的各学术机构吸引了5亿美元的外州研究基金,旅游收入达10.8亿美元;同时有50万外州学生在马萨诸塞州学习,他们的教育费用支出约达2亿美元……把直接费用支出和间接倍数效应合并计算,这些活动为州的经济增加了20.3亿美元的资金,并创造了13万个就业机会”^[5]。城市与大学有效合作不仅能够促进本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往往也能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城市生态圈,促进周边城市的发展和融合。譬如,美国东南部以北卡罗莱纳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为中心的“三角研究中心”导致周边的查珀尔希尔、罗利、达勒姆等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大学对城市的各项价值仍在增值之中,大学造成的土地升值、就业岗位增加、商业繁荣等经济价值还仅是表象,大学本身所负载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和生态等隐性价值则更为巨大。大学代表着城市的精神高度,是创造城市的生态力、文化力和“注意力经济”的重要组织,是城市软实力的基本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软实力的增值带给城市的收益远比城市硬实力的增值更加长效、更加让人期待。大学成为城市引以为豪的名片,“无论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陈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6]。然而,现代大学与城市的互动发展普遍存在着对大学的知识外溢、产业发展等显性的经济效益重视有余,而对大学在人文精神传播、文化外溢等方面的隐性价值则重视不足的趋向或逻辑,这是十分片面和短视的。试想,如果将大学从城市的版图上抹去,把大学用于商业开发的目的,或者引进了大学,但却仅仅看到了大学的经济价值,可能会使城市得利一时,但其远景则远不及大学为城市描绘的未来更加丰富多彩、美好绚丽。

参考文献:

- [1]徐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论大学与工业的关系[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71.
- [2]刘祖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城市群视野下的大学群发展新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3.
- [3]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滕大春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39.
- [4]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44.
- [5][6]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0,246.

(责任编辑:冯永刚)